

中国需要引导资本的机制

<http://www.criifs.org.cn> 2009年8月14日 半分

读了《Lex专栏：上山容易下山难？》一文后，我感觉文章让人揪心。

现在大家都在广泛谈论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因国家激进的信贷政策而流放出来的资金，大量的进入资本市场，从而引发狂热的资产价格上涨。

一边是累计上涨80%的上证综指，另一边是7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继续上涨的新闻报道。这些眩晕的价格上涨，对我新股民来讲，倒不全是一件坏事，因为这轮股市上涨让我入市就尝到了赚钱的滋味，但另一方面，却也引发了我作为一个国民对中国经济体的担心。我感觉整个国家像是一个喝醉了酒的驾驶员，黑夜里只打了个近光灯前进，面对突发的颠簸，不是猛踩刹车就是猛踩油门，却怎么也不想减慢速度，调整稳当了再图前行。

有国家政府部门说，中国必须保持7-8%之间的增长速度，才能比较充分的解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。可这既缺乏历史经验的验证（在30年的改革当中，中国也曾经在90年代初有低速增长，却也没见中国的就业压力有多大），又缺乏必要的理论说明。

诚然，投资的大幅支出和出口的稳步上涨，确实有效保证了中国近些年的高速增长，并且也消化了大量由农村涌入城市的劳动力。可是，这种经济结构形态是畸形而不可持久的，是以积累未来的结构性矛盾为代价的发展。由政府支配的投资，出现了大量的重复浪费且缺乏效率，并且排挤了来自民间的项目投资。而对外依赖的出口贸易、配合独特的汇率政策，使中国经济体被其他经济体所绑架，而这种绑架从长期来讲，很难说是互惠互利的共赢，耗费着中国的环境资源不说，而且还有影响中国的产业升级之嫌。

而一直充当着小弟弟角色的国内消费，经济学家认为是可靠的内生增长之源，却一直以来不温不火。怎么可能火的起来呢？改革开放期间所得经济成果，大量的被政府通过土地、税收和汇率政策等方式积攒了起来，有消费力的是政府投资，而不是普通老百姓。

在此次次债危机之前，很多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已经对这些达成共识，当时政府也已经有意识的通过各种政策，来改变当前这种经济增长模式：通过紧缩银根等方式限制投资，通过汇率、出口退税等政策来引导出口。而当次债危机来临之际，无奈的是，中国只剩下疲于应付一条计策了，毅然放出流动性这条猛虎，至于怎么收回来，尚未可知。然而，刨去我们事后诸葛亮的分析，应该承认的是，对于政府来讲，这种类型的刺激尽管不妥，却也无奈。

可是，毫无疑问的是，这样做的问题很大，而且对这个问题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。放出来的资金，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，一转身就大张旗鼓的投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，这应该引起国家的足

够重视。国家不能只管资金的批准投入，而不管资金如何达到它该去的地方，正如国家不能只管给农民发放补贴，而不知道如何确保资金能真正进入农民的口袋一般。

当前的现象，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即整个国家在资金的引导方面存在缺陷，资金没有有效途径进入实体经济中。我还记得郎咸平教授当年的疾呼，中国的私企老板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，没有办法，只有将钱砸到股市和楼市里面去炒了。可是这样的局面，除了会抬升资产价格之外，不会给国家实体经济带来助益。

而在我看来，中国缺乏有效引导资本利用的机制。设置股票市场，不是为了设立一个大家可以投机敛财甚至赌博的机制，而是为了保证有潜力的企业和项目能够筹集到资金。可我们现在只看到一个个大的企业上市敛财，而有潜力的私营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却很少拿到上市的通行证。大家冲着股票的投机性冲击股市，却很少有人在意能不能收到像样的股利分红。

庆幸的是，近年来，很多高科技企业得到了风险投资家的亲睐，可问题是，风险投资家面对中国的上市环境，只有一脸苦笑，鉴于境内缺乏资本撤出的有效机制，只能转身投向境外上市，这极大的限制了风险投资的规模和运作效率。众多的私营小企业，在量上已经是经济体的主力，可是要想从银行那里拿到钱，实在是个技术活儿。效益不错，银行拼命想借钱给你，可要是效益下滑，你求谁都不灵，银行第一个会要你命。好在民间会运作出如浙江地下钱庄的机制，却也面临着法律地位上的不认可风险，纯属区域性的地下运作……

这些都是摆在面前的问题，这些都在向我们揭示目前资本利用和引导机制的缺陷。国家

做的，不是一出事就想到通过银行来投放资金，而是应该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投放渠道和机制，运作多样化的金融市场，来保证中小私营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资本需求。这样做，在政府层面上能有效保证资金投放的风险控制、准确度以及效率，而更重要的是，可以激活经济体中最有创造力和灵性的中小企业，激活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能量，最终积累经济得以长期发展的内在动力。

西方学者在总结西方财富增长的过程中（《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》）曾指出，西方经济发展的活力在于允许各种经济试验，且具备试验所必需的各种资源、高度分散决策权、并对成功的试验给予经济回报、对失败的试验给予严厉惩罚。中国业已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和企业制度，能够保证奖惩和决策权的分散，但是对第一条的支持显得不足，那就是能够允许并保证来自民间的企业家们、来自高校的科技工作者等人，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，获得经济资源，实现发展。这需要金融机制上的保障，需要多元化的金融渠道来疏导资金，以便使其进入最具能量的经济单元。

文章来源：FT中文网      （责任编辑： zfy）

